

重刊《永乐北藏》前言

葛兆光

—

永乐年间，从朱元璋裔孙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曾两次编纂佛教大藏经，先是依照洪武年间在蒋山寺编印的《洪武南藏》，于南京编刻《永乐南藏》。接着在永乐八年（1410），他又下令在北京刊刻《永乐北藏》。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记载，明成祖曾经颁旨，要求在南北各刻大藏经一副，另外还打算“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圣旨：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¹，但是，不知为什么，石刻大藏经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施行，倒是《永乐北藏》确实从永乐八年之后，由栖岩慧进等高僧领衔，“总督海内文学儒士高僧，于海印经馆校大藏经”²。

这一编订刻印的时间很长，大约近十年《永乐北藏》才大体成型，据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记载，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初三日即《永乐南藏》将近完工时，明成祖特别关照此事，“宣道成、一如等人入于西红门，钦奉圣旨：‘将藏经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板，经面用湖水褐素绫’。”第二年（1420）当时的僧录司左觉义栖岩慧进上奏，说“恭惟圣朝校勘藏典，乃千载之希遇”，所以，希望皇帝“御制序文，以冠经首”，明成祖似乎很高兴，颁下“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为各经之首，圣朝佛菩萨名称佛曲五十卷、佛名经作三十卷、神僧传作九卷，俱入藏流行”，再一年后即永乐十九年（1421），全藏大体编定，永乐皇帝便命工刊刻。并于二月初二日下旨，“你刊经板了，着你每（们）坐山去，我也结些缘”。还问：“板就那里刊好？”因为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便指示“就寺里刊好”，也就是在海印寺刊刻³。

永乐十七年到十九年的时候，雪轩道成（1352-1431）是右善世，一庵一如（1352-1425）是左阐教，栖岩慧进（1355-1436）是左觉义⁴，编印藏经当然就是官方的事情。不过，尽管是官方行为，这部《永乐北藏》的刻印进展却很缓慢，虽然永乐皇帝早早地就给它写了序文，特别撰写了经序和佛菩萨赞跋，颁下了以他名义新编的经典⁵，但似乎全藏的刻印要到正统五年（1440）才全部完工，那时，明成祖和继其为帝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已经去世，由明英宗朱祁镇再次给它写了序文。序文中，接着明成祖《御制藏经赞》有关刻印藏经是“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的说法，明宣宗说明成祖“惟大孝之诚，孳孳夙夜，孔怀劬劳报本之道，图荐考妣在天之福。于是博采竺乾之秘典，海藏之真诠”，如果这些例行套话说的是可信的，那么，编印这套大藏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孔怀劬劳报本之道，图荐考妣在天之福”⁶。

这套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用了二三十年才完工的佛教大藏经，就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通称《永乐北藏》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

¹ 《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943页。

² 《补续高僧传》卷四，《卍续藏经》七十七册，393页。

³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18册，第471页、第474-475页。《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记载当时召见的除了道成一一如外，还有六人，命其“校勘藏经，新旧比对，聚僧写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942页。

⁴ 善世、阐教和觉义都是明代洪武十四年以后（1381）设立的僧官，善世最高，为正六品，阐教次之，讲经再次之，觉义最低，为从八品，但都是中央政府管理佛教事务的核心僧官。

⁵ 《补续高僧传》卷四，《卍续藏经》七十七册，392页。这些序赞，李富华、何梅《汉文大藏经研究》第九章《明官版大藏经研究》435-438页已经详细开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⁶ 《明英宗实录》卷73，第1413-1414页。

二

说起汉文大藏经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先简略地说一下佛藏的结集、流传和汉译，再简略地介绍一下《永乐北藏》之前汉文大藏经的写本和印本。

据说，在公元前 479 年孔子去世之前的几年，大约在公元前 486 年，释迦牟尼即佛陀涅槃，为了传播和捍卫佛陀思想的纯洁性，也为了统一弟子们各自相传的佛陀言论，释迦牟尼的弟子们曾经聚集在一起，对释迦牟尼的规训进行整理和归纳，有人回忆和背诵，有人质疑和确认，大致程序是：（一）回忆和背诵。由佛弟子优婆离和阿难分别诵出佛法的戒规部分和义理部分。（二）质疑和审定。经过其它佛陀弟子同意、或提出异议，然后共同认定。因此，佛经的开首语必为“如是我闻”。（三）编纂和分类。把共同认定的佛法编集出部类次第。（四）持诵与传播。由诵经者、持律者持诵宣讲。

这种结集在佛陀之后的数百年中，据说经历了三次（一说四次），佛陀的演说、言谈、教导，即有关佛教思想的部分，后来叫做“经”（“达磨”，Dharma），佛陀有关宗教纪律的训导，后来叫做“律”（“毗奈耶”，Vinaya）。此外，后来对佛教思想又有种种说明和解释，这些并不是当时背诵和回忆出来的，是后来陆续产生的，这些叫做“论”（“阿毗达磨”，Abhidharma）⁷。把经律论合起来，就是后来说的“三藏”，后来所谓“三藏法师”，就是指那些精通整体佛教典籍和理论的义学高僧。

由于佛教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流传中不断膨胀和分化，从原始佛教中分化出上座部和大众部，在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后分化为种种派别的佛教教团，从各种部派佛教中又化生出大乘和小乘。所以，为了证明自己道理的权威性，也为了借助佛陀说法来整肃教团的纯洁性，更为了宣扬自己道理的正确性，此后的几百年中，佛教徒又有过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的结集⁸，于是本来应当“如是我闻”、“出自圣口”的佛说，数量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后世的种种新增新编的佛教论述也渐渐融入其中。

而这时已到了公元一世纪，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夕。

三

佛教传入中国是什么时代？关于这个问题有种种说法，不过一般都同意，大概是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 58-75 年）即一世纪中叶。正如梁启超所说，“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⁹，不过从佛典汉译史上看，二世纪中叶也就是东汉桓帝、灵帝之际（147-189）相当重要，尽管佛教势力在社会上可能还很微弱，但后来蔚为大观的译经事业却渐渐开始，作为标志性的人物，安息人安世高和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在那时先后到达洛阳，并开始翻译佛经，经过一百多年，大约到 280 年也就是西晋统一全国的时候，译成汉文的佛经差不多有 265 部，411 卷了¹⁰。再往后，从鸠摩罗什到玄奘，从南北朝到隋唐，来自异域的僧人和出身汉地的中国

⁷ 参看【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第七章《三藏结集》183-205 页，商务印书馆，1987；【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第三篇第十三章《圣典》，380-407 页，商务印书馆，1982。

⁸ 第一次结集又称五百结集或王舍城结集；第二次结集又叫七百结集或毗舍离结集。

⁹ 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载《佛学研究十八篇》3 页，中华书局据 1936 年《饮冰室转集》本影印，1989。

¹⁰ 根据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佛教目录南朝梁代僧祐编的《出三藏记集》著录，在南朝梁代，中国汉文佛经就已经达到 2162 部 5310 卷，较西晋时翻了十倍。

佛徒，陆续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据《开元释教录》卷一的记载，“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见行阙本，并该前数”，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后来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中记载，“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后来，各种中国僧人撰述也陆续收入佛藏，使得这一文献更大大膨胀。各种藏经尽管多寡不一，但大多在五六千卷以上¹¹。这一数量庞大的汉文佛教文献，远远超过了现存梵文、巴利文以及其它文字的佛典数量，所以汉译佛典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完整的佛教文献，而佛典汉译也一直是印度佛教在中国输入和传播中最具意义的事情，在各种《高僧传》中首先立的就是译经者的传记，可见，古代中国对于翻译和介绍外来思想的人是很看重的。

不过，从南北朝到隋唐，虽然都大规模地收集、整理和登录佛教的书，不过那时没有刻板印刷的技术，所以都是手钞本，我们看到敦煌藏经洞里面成千上万的佛教经典，就是手抄的。当然，到了唐代，渐渐便有一些零星的佛典刻印，现在还有一些残片保存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真正完整地刻印大藏经，则是在宋代开宝四年（971）以后了。这时下距正统五年（1440）完工的《永乐北藏》，有近五百年。在这五百年间，中国和朝鲜陆陆续续出现了好些官方刻印的或寺院刻印的藏经，官方刻印的，如开宝藏¹²、契丹藏¹³、元官藏¹⁴，以及前面提到的洪武藏¹⁵，而寺院刻印的像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赵城金藏¹⁶、碇砂藏¹⁷、高丽藏¹⁸等等。

四

《永乐北藏》就是前述若干种藏经之后，在明初由官方刻印的一种佛教大藏经。《永乐北藏》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到《大明三藏法数》，共收录了佛教典籍包括翻译的佛典和中国佛教的著作共 1615 部 6361 卷，分装 636 函。它以千字文编号，先以“经”、“律”、“论”三藏分，包括（一）“大乘经” 537 部（依次是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槃部

¹¹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说，“明清、高丽、日本诸藏，虽互有增减。其所出入者，多此土撰述。大抵印度经、律、论、集传等，译成国文者，汰伪除复，现存实五千卷内外。”载《佛学研究十八篇》185 页。

¹² 开宝藏又称“北宋官版大藏经”，指的是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开始，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在益州雕板的佛教藏经，这是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大藏经，有板十三万块，运至开封印经院印刷，收入佛典及圣贤传集 1076 部 5048 卷，后传入日本、朝鲜。

¹³ 又称辽藏，为辽兴宗时（1031-1054）刻印的大藏经，即后来房山石经之底本，现已佚，仅存应县木塔所存 50 轴残卷。

¹⁴ 元代官方刻印的藏经，大约是由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发起，由徽政院主持，于文宗至顺三年到惠宗至元年间（约 1332-1336）刻于元大都，1979 年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 32 卷。

¹⁵ 有学者指出，洪武藏雕印于建文帝年间，因此不应当称作“洪武藏”，应当叫“初刻南藏”。李富华、何梅《汉文大藏经研究》第九章《明官版大藏经研究》375 页。

¹⁶ 指十二世纪在金世宗时代，从皇统八年到大定十三年（1148-1173）刻印的大藏经，1933 年释范成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于是又称为“赵城金藏”，原来据说有 6000 多卷，现存 4957 卷，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1935 年曾经影印过其中一小部分，大概是四十九部罕见的，叫《宋藏遗珍》。

¹⁷ 这是 1930 年代朱庆澜在西安卧龙寺和开元寺发现的宋代刻本，大约是南宋理宗绍定四年至元代至治二年（1231-1322）在平江碇砂（现在的江苏吴县）延圣禅院刻的，是梵夹本，1532 部，6362 卷，仅仅缺了 173 卷，1935 年将它（其中缺的部分加上北平松坡图书馆所藏的“思溪藏”），在上海影印出版，改成方册本。

¹⁸ 指十三世纪的高丽国高宗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1236-1251）刻印的，收了 1521 部 6589 卷佛教著作，现在八万片木板，仍存于韩国庆尚南道的海印寺。由于它用好几种藏经对校过，所以相当好，日本的大藏经就用它来校勘。

所谓大乘五大部)、(二)“小乘经”239部、(三)“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300部(以上经), (四)“大乘律”25部, (五)“小乘律”59部(以上律), (六)“大乘论”93部, (七)“小乘论”37部、(八)“宋元续入藏诸论”23部(以上论)。然后再加上(九)“西土圣贤撰集”147部, (十)“此土著述”155部, 一共为十大类。与《永乐南藏》相比, 门类相同, 只是“西土圣贤撰集”从经部后面的第四类, 挪到了所有经律论之后作为第九类¹⁹, 所收的经典也互有不同²⁰。《北藏》为梵夹本, 每版二十五行, 分为五折, 每折五行, 每行十七字, 不仅版框加高, 字体加大, 而且校勘七次。在装帧上, 它也比《永乐南藏》更加考究²¹, 以绫作封面, 突出了皇家的气派。由于它藏在京城, 一直是作为朝廷赐给各地寺院的供奉品, 比《永乐南藏》允许私家捐资印刷供养, 更具有官方色彩。

应当注意到, 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的宗教制度相当严格, 虽然明太祖和明成祖始终对佛教并没有打压之意, 尤其是明成祖因为道衍(姚广孝)的缘故, 对佛教相当有好感, 但正如姚广孝所说, “上自开国以来, 万机之暇, 留心圣教, 设官分司以理其众, 鉏奸剔虫, 欲复古规”, 即站在世俗皇权的立场坚持限制佛教扩张²²。洪武之初, 朝廷曾反复抨击“释老二教, 近代崇尚太过, 徒众日繁, 安坐而食, 蠹财耗民”, 并且规定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 对取得僧尼道冠资格的知识给出严格要求, “天下僧尼道士女冠, 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 皆给度牒, 以防伪滥”²³。我们就知道, 在明代初期皇权膨胀的时候, 佛教基本上是在官方严格控制之下的。特别是胡惟庸案之后, 洪武十四年设立僧录司, 洪武十五年规定佛寺为讲、教、禅三种, 规定天下僧道服色, 洪武二十四年, 一方面规定天下生员的冠服之制, 使儒家学人统一化, 另一方面发布《申明佛教榜册》, 说佛教本是“中国之异教”, 严禁僧人“与俗混淆, 与常人无异”, 并在洪武二十八年命僧录司“设上中下三科, 考试天下沙门”²⁴, 佛教更是在官方严格的管理之下。这种佛教政策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

前面曾经提到, 参与《永乐北藏》编订的, 正是一批经官方认定的合法佛教领袖, 雪轩道成在洪武年间曾经担任过青州道纲(按《续补高僧传》作“都纲”)、僧录司右讲经, 在永乐初年还奉旨出使日本, 原驻天界寺, 明成祖特意招他去北京, 任僧录司右善世, 主持大藏经的編集刻印²⁵; 一庵一如是大报恩寺都讲, 与明成祖的重要谋臣姚广孝关系极好, 姚是亦僧亦俗的奇人, 而称一如是“两浙一人”²⁶, 可见他的声望。他在编刻北藏中似乎是主要人物, 他主持编纂了《大明三藏法数》四十卷。栖岩慧进是被明成祖看中, 特意征召到南京天界寺和灵谷寺作为青年僧人的导师, 并参与纂修《大明三藏法数》, 后又随同到北京, 成为“领袖天下僧众”的僧官²⁷。其它一些僧人, 如庵进、思扩、法主甚至一些校讎僧人, 也是经过礼部或僧录司挑选, 经过皇帝认可的。从后来的资料看, 他们在编纂和校勘中, 时时事

¹⁹ 吕澂先生认为, “把西土圣贤撰集改放在论藏之后, 这是比再刻南藏更为合理的”, 《永乐南藏》, 载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五), 28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²⁰ 《北藏》比《南藏》增加9部152卷, 同时又缺少7部155卷, 包括《佛祖统记》、《古尊宿语录》、《续传灯录》、《禅宗颂古联珠集》等等, 究竟是什么原因还不清楚。参看《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卷四, 《大正藏》第87册, 299页;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九章《明官版大藏经研究》, 449页。

²¹ 它的版框较《南藏》高2厘米, 宽1厘米, 更显得阔大。

²² 姚广孝(道衍)《送伏晦中住兴化府囊山禅寺序》, 载其《逃虚类稿》卷三, 《四库存目丛书》第28册, 112页下。

²³ 参见《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明实录》卷七十七; 并参看野间潜龙《明代文化史研究》第三章第一节《明初の佛教政策》。

²⁴ 《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 936、938页。

²⁵ 《续补高僧传》卷十六, 《卍续藏经》第七十七册, 487页。

²⁶ 《续补高僧传》卷四, 《卍续藏经》第七十七册, 393页。

²⁷ 《续补高僧传》卷四, 《卍续藏经》第七十七册, 392页。

事要请示，不仅原来宋代藏经中原有宋太宗若干佛教著作如《缘识》、《逍遥咏》等五种不再收入，而收录了以明成祖即永乐皇帝名义编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四十卷、《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神僧传》九卷²⁸。另外，如佛教史书《佛祖统纪》、禅宗著述《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以及元代白云宗僧人的《白云和尚初学集》等，也奉了永乐之旨不再收入藏经²⁹。显然，在作为明代新首都的北京，凸显新朝皇帝之无上权威，一批新权贵僧侣接受旨意，为新王朝编纂新圣典，印制出一套较《南藏》更加豪华的佛教藏经，作为朝廷颁赐寺院的经典，是在有意识地呈现和传达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

五

尽管《永乐北藏》的编纂刻印中体现的是明代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但一大部藏经却毕竟是佛教文献汇编，如果研究佛教思想和历史，它仍是明以前佛教资料宝库。不过，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并不是所有“如是我闻”的佛教经典都是佛说，并不是所有佛教的记载都是信史。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使用大藏经。

研究佛典的学者早就指出，佛教典籍虽以“闻如是”为始，以“信受奉行”为终，其实往往是形式上假托佛说，实际上，大多乃佛教徒在历史中的一系列创作。所以，这里面有再三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这些记录、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文字笔录、翻译纂辑，最后综合起来便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庞大藏经。因此，在阅读佛藏的时候要意识到，这里包含了若干种种不同状态的佛典：被翻译成汉文的早期佛教经、律、论；被翻译的大乘佛教的著述；中国佛教徒伪撰的早期印度撰述，即古人所说的“疑经”和“伪经”，以及中国佛教徒自己的著作。所以，一部大藏经，是历史层层叠叠构成的，它就是一部“经典传译史”加上一部“思想诠释史”。

也许，可以介绍给读者的是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有关佛典历史的七原则，小野在《佛教经典总论》第三部《大藏经概说》之第二章《根本佛典小考》中提出³⁰：

- 一，佛教经典是随着时代，一部一部次第形成的。
- 二，作者并非仅一、二人，形成的年代也各不相同。
- 三，作为无名著作的经、律，与署名著作的论同为佛教典籍，应同样看待。
- 四，佛教著作的地点不一，有印度、中印、南印、西印、北印，也有中亚、西域及其它地方。
- 五，中国传译的经论，并非仅仅翻译的旧典，也有新出的著作。
- 六，逆向上溯中国佛典翻译的历史，可以看作经典著作的历史，能够窥见经典形成的历史。
- 七，前后约一千年的佛教经典著作历史，透过中国传译史，大体上即可把握不错的佛教史概念。

²⁸ 蓝吉富《汉传刊本大藏经之入藏问题》，载其《听雨僧庐佛学杂集》404页。台北，现代禅出版社，2003。

²⁹ 据说这些佛教著作之所以不允许入藏，有的是因为涉及建文帝，有的则可能是被视为佛教的旁支异端，参看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九章《明官版大藏经研究》，441页。

³⁰ 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佛书解说大辞典》别卷，大东出版社重印本，1988。487页。又，此书有杨白衣中译本，此处参用杨氏所译，略有改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永乐北藏》也可以作如是观。

六

永乐到正统年间陆续刻印的《北藏》，一个半世纪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增补。据僧人本在的说法，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依照酷爱佛教的万历生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与万历皇帝本人的旨意³¹，“请出大明续入藏经四十二函”（编号的是四十一函，有一函不计入），基本上是中国佛教徒自己的著述³²，一共有三十六部四百一十卷，作为《北藏》的续编，经过一年时间补刻出来，并分赐各个寺院。对于佛教史研究者来说，这批补刻入藏的文献尤其可贵，比如，原来被永乐禁止入藏的《佛祖统纪》、《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等等佛教尤其是禅宗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被重新收录进来。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印《永乐北藏》，就包括了永乐至正统年间刻印的大藏经和万历年间补刻的续藏经两部分，总数就达到 1651 部 6771 卷。

也许，在各种大藏经中，《永乐北藏》并不特别受重视，但应当指出的是，它校勘较精，装帧精美，收录也有明代特点，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别可以一提的是《永乐北藏》的目录即《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四卷（后来被收录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七册《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册中），它就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所编，1882 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英文佛教目录的基础，南条文雄只是在它的基础上逐书编号，补充说明，并加英译，所以，它也是在世界上最早流传的汉文佛藏目录。

历代由朝廷下令编辑的庞大丛书，无论是儒家的、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它们不仅呈现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取向，宣示着那个时代的知识世界，还让后世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准。尽管此后的朝代还会有后来居上、更大更全的丛书，但在这个历史的角度看，就像地质学上的“地层”一样，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意义。《永乐北藏》正藏印出已经五百七十年，续藏刻印也已经四百二十多年了。现在，尽管各种旧的大藏经一套一套被影印出来，新的大藏经也被一次又一次编纂起来，但是，这部四五百年以前明代官方刻印的大藏经，作为基本佛教典籍的汇编，作为一部经过较好校勘的藏经，尤其是作为明代佛教知识的见证，我想，它仍然有其价值。

2010 年 7 月 8 日写于复旦大学

版，442-443 页。

³¹ 《明史》卷一一四《后妃》记载她“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3535 页。

³² 其中一些著述，可能刻印较早，如《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卷末即有“万历七年六月吉旦慈圣宣文皇太后发心重刻”字样。